

編後語

本期首欄以「中國政治改革的幾種思路」為題的三篇文章，作者儘管立場各不相同，但有兩個共同出發點，都強調：一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有關理論探討的迫切性；二、要避免在集權專制和社會失序之間的兩極震盪，追求從經濟變革到政治變革的平穩過渡。在這兩個前提下，甘陽不同意那種以聯邦、邦聯和分權為目標的政治改革主張。他認為，訴諸個別公民的政治參與權利的全民直選，可以有效加強中央權威，而中國共產黨已經或應該進一步自覺地實行轉型，這樣，中國就有希望建成民主大國。吳國光則提出，中央與地方關係是制度變革的軸心問題；一個現實而必要的選擇，就是促進制度化分權，從而推動從政治「自由化」到「民主化」的過程。鄭永年根據近幾年中國鄉村選舉情況，討論中國農民特質、鄉村民主前景以及中國政治改革進程，從而對視農民為實現民主阻力的西方理論提出挑戰。正如吳國光所說：「為中國政治『解咒』，是歷史的和民族的任務。」我們相信許多關心中國前途的學者和朋友，都願意從理論與中國實際這兩方面參加這個討論，以拓寬和加深政治改革的思路。

今年值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，文革一時成為學術活動和報刊的主要話題。本刊去年8月、10月號一連兩期推出文革研究專輯，已經引起廣泛重視，目前我們正在準備新的文革研究專輯。今期有三篇與文革有關的文章：林焱記述了一個在文革中家喻戶曉，但今天已幾乎被遺忘的小人物——陳里寧。為了打倒劉少奇的政治鬥爭需要，這個精神病患者曾被推上政治舞台，扮演新時代狂人的角色。老作家和新聞工作者馮英子則以親身經歷，記述《新民晚報》被砸爛的過程，以及他淪為「牛鬼蛇神」的非人遭遇。這樣，從一個人、一個單位的命運，我們可以從旁窺見30年前那場運動反理性、反人性的性質。郭建的文章參與本刊有關「後學」的討論，他刨根究底，論述文革思潮如何影響西方後代理論的形成，這一點似乎是倡導「後學」的中國大陸學者很少提及或者注意的。

本期佳作尚多，不再一一介紹。最後需要報告的是，本刊製作助理黎群嬌小姐於四月離開了編輯室，我們祝願她今後工作順利、身體健康。